

■新作聚焦

陈建功非虚构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直面“脏”心怀“爱”成大器

□潘凯雄

建功兄现在自然是名副其实的老作家了。

这个“老”既是生理年龄意义上的年长,更是从事小说创作资历上的资深:1973年,这位尚不足25岁的青年矿工便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就读北京大学二年级时的他更有《丹凤眼》这样的成名作问世,不仅在后来被称为“新三届”的大学生中,同时也在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再往后,《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作品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前身);与赵大年合著的长篇小说《皇城根》在90年代初被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而成为国产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先行者”之一。正当读者对他的创作报以更多期待时,他却奉命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承担起为全国文学创作服务的工作,其势头正旺的个人创作不得不戛然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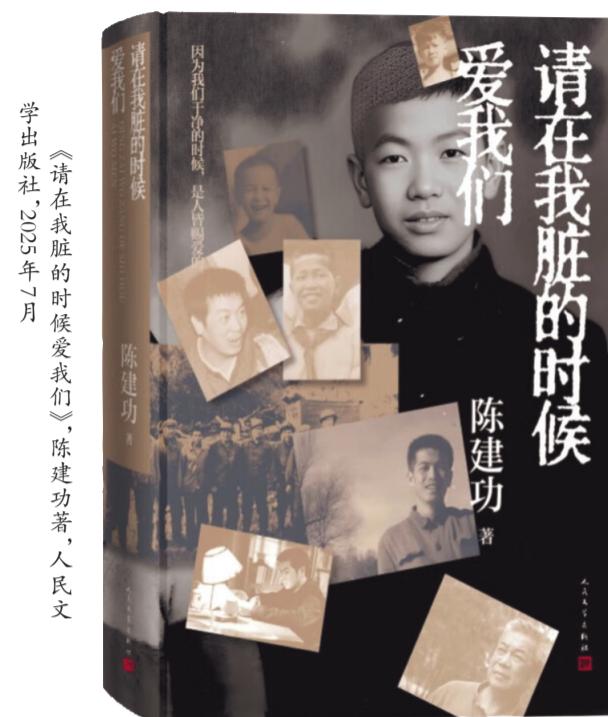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细节。21世纪之初,在中国作协会议室研讨一部部长篇家族小说的间歇,建功兄表情复杂地说:“我退休后也要写一部家族题材的长篇,那内容可比这要丰富得多。”那时,我已在文学界工作多年,正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不难体会到他说出这句话时,那看似不经意实则复杂的心境,遂立即接过话来:“那我现在就预约大作啦!”不曾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20年,一直等到我退休数年后,建功兄才拿出了他荣休后的第一部作品。没想到,这部作品竟然不是他此前说过的家族题材,甚至体裁似乎也不是他过往从事业创作的“主业”——小说,而是名为《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的非虚构之作。

这当然令我好奇,加之想了解其新作命名等缘由,使得我在第一时间就拜读了建功兄的这部新作。“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原本出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中一个名叫列比亚德金的“可怜虫”之口,后面还有一句“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需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这部名著和这句名言在陀氏笔下自有其特定时代的复杂性及特定所指,而建功兄这里的“借用”在我阅读完整个文本后方明白:是因为它正好使得作者“在这十年故事的迷途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如同创作时常用的一个“楔子”而已。

在我看来,对于一位长期从事小说创作这种虚构文体的作家而言,首次从事非虚构的创作当是有一定难度且冒着一定风险的。以虚构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小说倚仗的主要“武器”之一是合理想象力的恣肆飞扬,相较而言,非虚构创作则犹如“戴着镣铐跳舞”,理论上虽也允许一定程度的想象,但更多只能体现在旁枝末节等处而非关键处。这样的限制对长期从事小说创作的建功兄而言,必然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确是不少带着这样的疑虑进入阅读,后来发现自己是“杞人忧天”。

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是以建功兄1968年至1978年间的十年矿工生活为基本素材,并通过那时的矿工、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编织人物网络进而辐射到整个社会面,并凭借个体记忆再现了彼时矿工生活的种种场景与市井百态,特别记录和再现了李贵忠、老董、王大溪、老魏头、耕子和伊可忠等人物形象。既为非虚构,“诚实”自然成为创作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但在审视个人精神世界的同时,建功兄也不时运用幽默调侃的笔触来消解苦难叙事,总体形成了一种平视视角、平民化的叙事风格。

从20余年的小说创作经历到几乎封笔十余年,再到用这部非虚构写作来重启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样一种不小的“跌宕”对建功而言,既有难以左右的“不可抗力”,也是他对



自己整体创作的一种理性规划。《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固然严格遵循着“非虚构”写作的基本原则,但又确实存有不少有别于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的个人印记,这是我们在阅读与评价这部作品时应格外关注的。就就个人阅读而言,至少有如下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坚持平民叙事,用最朴实的话语讲故事。从《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依稀读出数十年前建功兄创作小说时的基本腔调:来自民间的生动、鲜活、诚实和坦率。这是属于陈建功独特的叙事腔调,无非是在小说写作时表现得更恣肆、更狂放;而进入非虚构写作时则相对节制,注重分寸。这当是由小说与非虚构两种不同文本的本质所决定的。

坚持直面自身,将自己“装进去”。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对当年那些曾经有过的迷茫、犹疑、脆弱和苦闷,建功兄不回避、不掩饰、不夸大,只是表现得比较内敛,而不是如同在他曾经的小说创作中那样借助于合理的艺术想象与夸张,将其展示得更加直白、更加透彻。

坚持解构苦难,不刻意塑造特定历史时期的悲情英雄。卒读全书,不难看出建功兄对此有着清晰的思考,避免将那个时代的日常苦难转化为今日作家笔下“头顶上的光环”。相反,还不时以自嘲的口吻将那些可能被塑造的悲情英雄一一解构。

坚持宽容基调,只是呈现而非谴责。不难想象,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是非错乱的岁月里,的确有少数人对建功兄这样家庭出身不太光鲜的、来自城里的学生娃是带有偏见的,因而给其带来侮辱与伤害也并不奇怪。面对这些,建功兄却少见控诉或强化,而是充满了宽容与体谅:“也想不到哪儿去,不过是见风使舵恐落人后罢了。”同时还不乏解剖自身: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以陈建功在1968年至1978年间的矿工生活为素材,再现特定年代众生相。全书秉持平民叙事、直面自我、解构苦难等原则,以宽容基调书写历史,兼具真实性与文学性。作者虽转型非虚构创作,但仍延续其小说的独特叙事风格

“你又何尝不是呢?”如此这般对自身的解剖,皆不是那种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一种反省与自省兼备前提下的醒悟。

建功兄始终坚持文学初心,即便是非虚构写作也不例外。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李贵忠、老董、王大溪、老魏头、耕子和伊可忠等人物形象无不生动鲜活,呼之欲出,催人泪下。还有建功兄在自己已经“不脏的时候”依然怀念着儿子那个牵羊的同学,惦念那曾在病床前照顾自己的老张师傅……凡此种种,使作品中无论是当年的人物还是生活场景,既有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言行,亦不乏文学的醇厚滋味。

最后,我还想就拙文标题再多说几句。“直面‘脏’心怀‘爱’成大器”中的前六个字是我对建功兄这部新作内容挂一漏万的总体概括。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其内容的“直面”书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最基本的态度与底线,即便内容所及有些沉重,否则“非虚构”之基础将不复存在。建功兄虽以此为基本素材,但这个“脏”并非指矿工职业当时的工作环境之脏,而是暗喻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某些作为、某些言行、某种心理乃至某种环境。面对那时的“脏”,建功兄在直面的同时亦有“爱”相伴,包括对当年自己所遭遇的一些荒诞与磨难,建功兄不仅没有回避,还将自己也“装进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予以认识与评说。而这一切,既是科学理性使然,也是一位优秀作家“爱”之所至的必然。正因为有了如此“直面”的基本姿态,再辅之以“爱”的浇灌,才共同成就了这部《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总体上的“大器”。不过,尽管我喜欢建功兄的这部非虚构新作,依然热切期盼着作为小说家的他20余年前就在心中酝酿着的那部家族题材小说早日问世。

(作者系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评论家)

■评论

近期出版的《痛苦是条虫:麦家访谈录》共收录王德威、季进、何平、姜广平、季亚娅、骆以军等7位对谈者同作家麦家之间的8篇访谈,时间跨度达17年之久,不仅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清晰完整的麦家的创作图谱,也令我们对麦家本人及其创作观有了更加生动准确的认识。一场场坦诚、热烈、机锋交错抑或动情而深刻的谈话抛出诸多创作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吐露经验之谈的同时亦照见作家的一颗赤诚之心,问答唱和之间,谱写出一曲经验与天真交织之歌。

访谈主要围绕作品的创作、出版及传播展开。漫谈式的对话以丰富的细节揭秘麦家现象的真相,也铺陈出作家曲折而漫长的创作道路。麦家坦诚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这些经验源自他长达40年写作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成败得失,练就其深沉强大的文字力量。

早在2007年《风声》出版时,麦家就敏感地认识到小说日渐边缘化的发展现状。在他看来,除了娱乐至上的客观原因之外,部分作家不甚认真的创作态度亦负有很大责任,这种态度令其作品丧失了“最基本的真实感和可读性”,沦为平庸之作,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读者抛弃。对于小说的真实性,麦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与姜广平的谈话(《痛苦是条虫,会钻到深处躲起来》)中,当被问及是否刻意追求一种看似真实的纪实风格时,麦家表达了自己对虚构与真实关系的理解:小说作为一种以分享别人人生经验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体裁,绝不是作家个人欲望与情绪的彰显,一旦“被作家苍白的欲望虚构所颠覆”,必将走向与读者的决裂。他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改变此状况以“恢复读者信任”的初衷。如他所言,“我的小说经常被人当真,对号入座,不是我掌握了什么绝密档案,而是我从不滥用虚构的权利”。在与季亚娅的对谈(《从指缝中逃走的鱼,你会把它想象得特别大》)中,麦家重申对真实感的呼吁。他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感并不依赖于素材的真实与否,好的文艺作品是要把“假的”变成“真的”,即虚构出具有真实感的故事,而不是将原本真实的素材生硬地包裹成“趣味寡淡”的“教育材料”。因此,小说家必须学会区分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找到“正确的机关”以打通连接二者的暗道。

对于麦家而言,这个机关就是讲故事的技巧。在同何平的对谈(《我庆幸自己没有迅速成名》)中,麦家谈到当代小说对故事性的轻视现象,“看轻故事是中国当今小说的一种时髦”,在他看来,故事才是小说的“上层建筑”。麦家坚信,只有恢复讲故事的传统,才能令小说寻回失去的读者,因为读者不会刻意带着“要在作品中得到人生滋养”的愿望去阅读小说,滋养是在消遣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作家固然要有文学理想,有自己的独立的创作观,但“首先要尊重读者”,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功能最终要通过读者的接受来实现,不被读者看到和接受的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尚未完成的作品。然而,麦家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认为,作家应该去研究、了解读者的大致趣味,写作中既要朝此方向靠拢,同时又不能“放弃文学本身的品质”,换言之,尊重读者而不讨好读者的态度,才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麦家的小说是通俗小说。在他看来,“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不是敌人,是亲人”,他寻找的是一条雅俗共赏的创作之路,其特情小说系列正是用纯文学的手法处理通俗题材的尝试。《解密》《风声》中的故事既满足了读者的英雄情结,弘扬了主流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融入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麦家是一位文风独特的作家,在他笔下,故事、人物、主题、风格各得其所。季亚娅称麦家的小说有着“抽象、冷峭、简洁、干净”的文体风格,“更喜欢用严密的逻辑和高度概括的语言组织故事,而非通常小说那样用细节和情绪来说话”。麦家认为,自己的小说犹如精致机巧的匕首,“不宽广、不厚重、缺乏烟火气,但直指人心”。他坦言,这样的写作风格一方面和自己的性格以及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多年来的写作实践与探索,“作家的风格是慢慢形成的,他在探索中逐渐发现,形成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他面对文字时冷静而有耐心,能够做到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干净的语言、稳固的细节以及充满逻辑性与智性色彩的情节,是“一天写七八个小时,就五百字”的速度“推敲出来”的。《解密》曾经历过17次退稿。这迫使麦家不断地修改,前后易稿达11次之多。但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说,这在折磨他的同时也磨炼了他的写作技巧,同时打磨了小说质地,将他和他的文字一道打磨得“坚硬”而“锋利”。“追求准确性与合理性,不喜欢混乱和激烈。这是我的性格,可能也是我的文字的风格”,可谓文如其人。

创作经验之外,麦家更强调作家的“业心”。“业心”即是一颗“天真之心”,在同季进的第二次访谈《直面自我幽暗的内心》中,麦家谈及自己创作《人间信》时揣着一颗想要把“中国的哭声”记录、固定下来的拳拳之心,这哭声中既有女性被压抑的苦难,也包含了作家本人内心深处掩抑的复杂情感。这是他首次在作品中如此坦率地呈现自己内心的真实,但自挖掘的目的并不在于遗忘或和解,而是出于“不吐不快的本能”,这揭示了一个小说家以“说真话”为写作目标的文学理想。在麦家看来,要实现这一理想,真诚之外还需要热情。面对文学影视化、商业化愈演愈烈的现状,他认为,当代作家首先需要摆脱为影视改编或为畅销而写作的功利性心态,“别去迎合谁,要迎合自己,把自己最独特的一面展示出来”,写作技巧可以依靠后天的学习和打磨,但没有创作热情,就一定不会有好作品的诞生,功利性无疑将扼杀真挚的创作热情。正因如此,他将文学经验阐释为“一个如何使小说迷人、动人的经验:从迷人入手,向动人靠拢”,迷人需要精巧的叙事技巧,动人则需要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麦家看来,保持一颗天真之心对小说家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小说本就有着天真的传统与源头。天真是小说“起头的大路”,彼时这条路上人神杂处、奇正相生,现实与想象之间尚未划出不可逾越的界限,写作者凭借星空辨识方向,行走在神秘与广阔之中。麦家在致敬马尔克斯恢复这一传统的努力之时,也毅然选择踏上同一条路。他对黄依依、安在天、容金珍、上校等真实却又超现实的人物的传奇故事的偏爱与反复讲述,正是“一个真正的感伤的小说家,一个能调动认知和情感创作文学现实的人”对自我命运的感应与奔赴。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

保持一颗天真之心
——评《痛苦是条虫:麦家访谈录》

□王敏

■短评

养老不是“熬日子”,而是“过日子”
——读《直面养老》

钮敏与郭梦盈母女合著的《直面养老》,以31个鲜活的故事,为深陷养老困惑的人们拨开迷雾,也为建设更具包容性与温度的老龄社会,贡献来自民间的智慧。年近古稀的钮敏笔耕不辍,与“80后”女儿共同完成这部纪实佳作,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老有所好、老有所为”的养老真谛——这份坚持本身,便是书中最生动的“养老样本”之一。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直面养老》最打动人的是扎根现实的“真”。为了呈现最鲜活的养老生态,母女二人耗时近一年,深入北京多个区民政部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日间照料中心,远赴京冀两地多家养老院,采访数十位原型人物及其亲属。这份可敬的“笨功夫”,让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失独老人深夜对着空荡房屋发呆时的孤独,丁克夫妻规划养老时的审慎,单亲妈妈照料患病子女的艰辛,社区老人按下“一键呼叫”按钮时的安心,乡村“阳光食堂”里老人们用餐时的欢声笑语……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生硬的政策解读,只用朴素的文字将不同家庭的养老困境与选择娓娓道来。书中以六大部分板块构建框架,巧妙覆盖了当代社会多元的养老模式,尤其关注占比90%的居家养老。在“父母与子女”“婆婆与儿媳”的平行叙事里,“慈孝相依”不再是抽象的道德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日常:或许是女儿为独居母亲改造防滑浴室的细心,或许是儿媳陪婆婆跳广场舞时的耐心,或许是儿子远程为父母调试智能养老设备的贴心。这些细节打破了人们对“养老等于赡养”的单一认知,让我们看到,养老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代际之间情感的双向奔赴。

更难得的是,《直面养老》没有回避养老中的“苦”,也不吝啬展现其中的“乐”与“暖”。它既记录了失独家庭面临的“无人送终”的恐惧,也写了社区志愿者为他们搭

建“临时家庭”的温情;既探讨了老人入住养老院时的心理落差,也展现了“银发志愿者”在机构里发挥余热的活力;既提及丁克群体对传统养老观念的挑战,也呈现了他们通过社群互助构建养老保障的探索。这种“不回避困境、不放大焦虑”的叙事态度,让读者能理性看待养老问题。

当下,人们的养老观念正在悄然嬗变。从“养儿防老”的传统依赖到“多元养老”的主动选择,《直面养老》恰好捕捉到了这一社会转型期的养老需求。对于城市养老群体而言,书中的31个故事就像一面面镜子:想居家养老的人,能从代际互助的故事里找到相处之道;倾向社区养老的人,可参考“一键呼叫”“日间照料”的服务模式;考虑机构养老的人,也能从心理调适的描写中提前做好准备。每个读者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或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向。

这本书也是一份宝贵的“民间调研”。书中那些来自基层的创新实践都是经过现实检验的有效经验。这些“接地气”的案例比冰冷的数据更能反映养老事业的痛点与难点,也为构建更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的思路。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希望通过这本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和支持,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充实美满”。

相信许多读者都曾与亲友聊过“该如何老去”这个看似遥远却终将抵达的命题,我们或许并不甘于将未来岁月简单寄托于广场舞圈子或保健品讲座中,可仍会怀有对未知的衰老时光的忐忑之心。读《直面养老》时,这种焦虑渐渐消解——原来晚年可以有这么多活法。这本书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养老不是“熬日子”,而是“过日子”。

(作者系河南作协会员,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教师)

把收获的事情

交给土地

——读钟法权《珊瑚岛》

□钟泽畅 徐妹琦

《珊瑚岛》收入了作家钟法权近年来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9个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皆为作者关于青春与梦想、热血与命运的遥远追忆。蓦然回首,虽然往事已成过去,但往事并不如烟般消散,依然值得回味。

短篇小说《新兵下连》的故事发生于作者当兵之初,截取的是新兵下连的成长片段。2021年,作者在整理书柜时,偶然翻出了几张老干部当年赠给他的书画作品,回想起在干休所短暂停留时的所见所闻,短篇小说《乌头骡与将军》应运而生。短篇小说《蓝玉烟嘴烟杆》《流星划过的夜晚》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前者取材于作者儿时便听过无数遍的老辈人闹革命的故事。此前之所以没写出来,难度在于小说写的不是革命者的胜利,而是一场意外的突围失败。清明时节,作者回家祭祖,在母亲点燃的缭绕香火中,花子烈士壮烈牺牲的画面在他眼前浮现,故事也就水到渠成地在作者笔下铺展开来,叙述的难题迎刃而解。在这本小说集中,作者以青春之名,重塑了新时代的军人形象。同名中篇小说《珊瑚岛》中的珊瑚岛,指的是南海通往西沙的战略要冲,也是南海的重要门户。小说塑造了陈岛头、黄小舟、符海蛟、刘舵手、于三亚等意气风发的官兵群像。他们是珊瑚岛上最可爱的人。《红之恋》写的是革命战略转移期间发生的一则爱情故事,虽然年代久远,但烽火岁月的爱情依然闪烁着青春的光芒。小说需要作者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找准切口,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矿藏”,发掘与众不同的生活意蕴。小说集中的《黑夜里里的光星辰》《熊猫级患者》《护树记》等篇目均是如此。

文学创作是永无止境的求索。作家要像辛勤耕耘的农民精心侍弄土地那样对待自己的创作,来年能否有个好收成,得看选下的种子、生长的土壤、气候的好坏等因素,要以淡泊之心,把收获的事情交给土地。钟法权的创作正印证了这一点。

(作者钟泽畅系陆军某集团军学员队教导员,徐妹琦系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狮石乡人民政府公务员)